

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张建新

(湖南工程学院 体育教学部,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研究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厘清近代西方体育在上海高校乃至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以从中发掘对当今中国高校体育社团发展有着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从上海体育组织的产生、发展、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对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并从加强对外交流、发挥成员的民主性方面提出了对中国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发展历程;地位和作用

中图分类号:G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7-0175-03

在近代中国,无论是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教会学校,还是国人为“自强求富”而兴办的各式新兴学校,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推动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西方列强的强势侵入和国人的主动学习而传入国内的近代西方体育,不但是国人图求“强种强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近代中国各类学校的一个重要学习内容。作为最早被迫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诞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等学校,也正是在这些高校体育组织的引领下,上海才成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主要阵地。研究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历程,不仅可厘清近代西方体育在上海高校乃至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从中发掘对当今中国高校体育社团发展有着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

1 近代上海体育组织的产生

上海于1292年由镇升格为县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但上海能在江南这一经济和文化极其发达之地超越其它城市,而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国际性大都市,除了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状况息息相关外,“真正起作用的还要靠在舞台上活动的人,以及人赖以活动的体制、制度。对上海来说,主要是两个因素,即租界和移民。”^[1]可以说,上海在近代中国地位的提升,其转折点在于1843年的上海开埠,大量的国内和海外移民纷纷迁至上海,为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184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清政府签订《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并成立英租界后,“上海开始形成开放、宽容、吸收、尊重竞争秩序和规则的海派文化”^[2]。虽然租界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象征是屈辱,但作为中西文化汇聚之地,“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大多是从上海引进,在上海实验做出示范,然后再推广到全国。”^[1]西方

体育所表现出的“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主要依据;有着较为科学与完整的规程;具有较强的竞技性、趣味性与娱乐性”^[3],与海派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使得近代西方体育不仅很快就被上海这座城市所接受,也较为顺畅地得以发展并传播至全国各地。在华西方侨民将西方近代体育以消遣和娱乐行为展现在国人面前的同时,也常开展一些刺激性的体育项目竞赛。在竞赛过程中,各种在华西侨的体育组织也就应运而生。最早成立的是跑马总会,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5位英国侨民发起成立。随后,由在华西侨组织成立且较有名气的上海划船总会(1859年)、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1860年,亦称万国体育会)、上海足球联合会(1902年)、西侨青年会(1920年代)也先后成立。特别是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不仅投资建设一些公共体育场,还资助了各种西侨体育团体,推动了上海体育的发展^[4]。

2 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

2.1 高校校内体育组织的成立

虽然上海早在1850年就成立了体育组织,并对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起着引导和示范作用,但由西方侨民发起的体育组织在成立之初排华行为十分明显,租界的体育组织只对西方侨民开放,不接纳华人加入,甚至禁止华人进入租界的运动场所进行体育活动。因此,即便上海租界早就开展了各项体育活动,并成立了多个体育组织,但华人却极少参与其中,“许多运动当时属于西侨的生活方式。真正推动本土竞技体育的,则是教会大学和青年会。”^[5]

成立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先驱。虽该校在成立之初由于缺少运动设施,任学生自由开展体育活

动,但1883年,“学校渐注重体育方面之设备,略购体育用具。并买假枪五十枝,为兵操之用。”^[6]并且该校在1890年5月30日举办的第一次田径运动会创中国体育之先河,被众多中国体育史学人认定为“中国最早的体育运动会、中国最早的学校运动会、中国最早的田径运动会、中国最早的学校田径运动会”^[7]。圣约翰书院在1898年成立了学生体育会^[8],这应该是上海最早的高校体育组织。学生体育会负责开展各类体育活动,举办班际比赛。虽然书院的学生体育会是在美国教员的主持下成立的,但圣约翰当时招收的学生基本上是华人,因而,学生体育会主要是为华人学生服务的。此后,中西书院、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也先后成立了学生体育会。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上海各高校学生会体育部陆续成为各校学生会中的二级机构,负责平时组织校运动队外出比赛,学生会体育部逐步替代了以前学生中自发组成的各类体育会^[4]。

2.2 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作为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先驱的圣约翰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足球活动的高校,在1895年便开展了足球运动,并于1901年在学生体育会的组织下成立了足球队,人称“约翰辫子军”。而南洋公学也在1900年开展了足球运动,并于1902年(旧历1901年12月)成立足球队。圣约翰书院主动邀战南洋公学队,进行了上海高校间第一次足球比赛,南洋公学惨败。此后,两校约定每年举行主客场二次赛事,直到1926年才结束,共持续了25年^[4]。两校的足球赛事不仅是两校师生的节日,也成为上海的一大盛事。“正式比赛的时候,南洋还要出动好几百人充当啦啦队:敲锣打鼓,贴标语,结彩绸,甚至鸣放爆竹,煞有介事。学校附近的居民,甚至浦东一带的球迷都过江赶到徐家汇来观看比赛。”^[9]因为有两校组织体育赛事的先例,1904年4月23日,苏州的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邀请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中西书院(亦称林华书院)到苏州进行4校田径邀请赛。在赛会上,东吴大学的美籍教员司马德发起成立“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也称“四大学体育联合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四校轮流举办运动会:春夏之交比赛田径,冬季举行校际足球、网球比赛^[10]。这一次的田径运动会虽然不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校际运动会,但“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校际体育组织。至1908年,中华大学联合体育会共举行了5届田径赛。1909年,因南洋公学和中西书院的先后退出,联合会不宣而散。

2.3 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

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是民国初期华东地区影响力较大的高校体育组织。自中华大学联合体育会解体6年之后,东吴大学再次举行华东高校田径邀请赛,到会高校还有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沪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在东吴大学司马德的倡议下,于1914年5月15日成立了“东华六大学校联合运动”,亦称“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并由司马德任首届联合会负责人。圣约翰书院获得联合会成立当年的田径锦标,而南洋公学则获得在冬季举办的足球赛锦标。联合会在1915年增加了棒球和网球项目的比赛,1916年增加了篮球项目的比赛,而1925年排球也被纳入联合会的赛事之中。联合会还分别在1920年和1922年接纳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南京的东南大学加入。自此,联合会被社会统

称“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但《申报》亦称其为“东方八大学运动会”)。不过,联合会以教会大学为主,历届负责人也均由各高校外籍教师担纲,故联合会的事物多受外国人钳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由于圣约翰大学的552名师生不满学校当局对爱国师生的处罚行为,而离校成立光华大学。交通大学在向联合会提出取消圣约翰的会员资格被否决后,愤然退出联合会,随后复旦大学也宣布退出。此时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已名存实亡,并最终在1929年宣告正式解散。在联合会举办的52项次赛事中,上海高校共获得41次锦标,其中圣约翰大学22次,交通大学13次,远超上海之外高校获得的锦标数^[4]。

2.4 江南大学体育协会

经交通大学周家骥和复旦大学蒋湘青等人的倡导,退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新成立的光华大学于1926年3月14日成立江南大学体育协会。5月即有上海的持志大学和中国公学加入。随后,上海的暨南大学(1923~1941年间在上海办学)、大夏大学和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陆续加入。至1926年底,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共有9所会员高校。1932年,中国公学因“一·二八”事变造成校舍被毁而被迫退出后,江南大学体育协会仍保持有8所会员高校;1935年,因南京大学生体育协会宣告成立,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退出,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的会员高校减少为6所。1936年,因成员全部为上海高校,江南大学体育协会改组为上海大学体育协会,只是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迫停止各项活动。协会成立当年,即组织了田赛、径赛、篮球和棒球项目的赛事。协会在吸纳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进入后,于1927年增加了网球、足球、排球、越野跑和全能等项目的赛事,赛制也由1926年的年度制改为学年制。至1936年,协会一共组织了1次年度赛,10次学年度赛。在10个项目共计70个冠军中,上海高校不仅包揽游泳、棒球、径赛、足球项目的全部锦标,在其它项目的赛事中也占有绝对优势。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共获得9次锦标(其中田赛和越野跑各3次),而金陵大学只获得1次锦标(网球)^[4]。

3 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3.1 推动了近代西方体育在上海的传播

近代西方体育首先是在华西侨以消遣和娱乐行为展现在国人面前的,上海租界的各个体育组织在发展初期不仅禁止华人入会,甚至不允许华人进入组织所属的体育场所进行体育运动。正是在以圣约翰书院为首的教会大学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近代西方体育才在上海得以推广。在这一推广过程中,首推其功的应是各高校的校内学生体育会(或学生体育部)和高校间的体育联合会。学生体育会不仅负责开展各类体育活动,还经常举办班际比赛。在各高校学生体育会的推动下,近代西方体育成为上海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是在高校学生体育会协助下,上海各高校的校级体育赛事不仅得到各高校学生的关注,还成为整个上海社会所关注的大事件。“每逢运动会,上海各处绅士来观者,车马云集于门外。”^[8]联合会举办的校际间体育赛事更是观众如云,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体育在上海民众中的影响力。

3.2 引领了近代上海体育竞赛体系的构建

成立于1904年的“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不仅是近代上海最早的校际体育组织,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校际体育组织。虽“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仅维持了不到6年时间,但其5届田径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区域性体育运动竞赛的开展,更是加速了近代中国竞赛体系的建设步伐。“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宣告解体的第二年,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即在南京举行,并被国民政府追认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而后,一些区域性体育组织相继成立,如华北体育联合会(1913年)、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1914年)、华中体育联合会(1923年)。这些体育组织的建立,不仅促成了民国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的建立,更是“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竞赛有序化的发展,为中国近代体育竞赛体系、框架的构建创造了条件”^[11]。

3.3 促进了近代上海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

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高等教育水平也居全国前茅,“至民国时期,上海发展成为全国的教育重镇。高等院校(24所)名列全国第一,占全国院校的21.8%,而且在数量和学科设置上是全国最多和最齐全的。”^[12]正因为如此,上海高校不仅是上海学生的首选,对全国各地学生的吸引力也是非同一般。特别是“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等体育组织的成员高校,为了在校际或地区性竞赛中争取好成绩,进而提升本校的声誉以吸引考生,可以给优秀运动员提供非常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全国各地有着体育特长的学生加入,进而促进了近代上海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自清末至30年代,上海各大学比赛体现了上海最高的运动水平。上海参加历届全运会的代表队,多数成员来自各大学。”^[4]

3.4 提供了近代上海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平台

在1902年就开始校际间足球对抗赛的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一直是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的领跑者。1910年的民国第一届全运会上,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以37分和34分的成绩分获学校联合组第一名和第二名;圣约翰大学还包揽了网球比赛的前4名;黄灏(交通大学)则获得个人总分第1^[13]。1913年2月,在马尼拉举办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所得的36分中有26分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所得^[8]。除了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外,近代华东地区的高校体育组织,都有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参与。也正是在这两所教会和公立大学代表的带领下,上海高校体育组织构建了彼时期较为完善的体育竞赛体系,为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创建了优质平台。不仅培养了马约翰、黎宝骏、黄震、周家骥等体育专家,还输送了陈宝球、陈镇和、郝春德、符保卢等优秀运动员,为上海在全运会和远东运动会上获得佳绩奠定了基石。以上海高校为主体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协助远东运动会的竞赛委员会举行赛事,联合选拔运动员以参加远东运动会,更是开近代中国体育之先河。

4 启示

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固然与

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但其中也有对当今中国体育发展仍有着借鉴意义之处。租界的设置带给中国的首先是耻辱,但也使上海成为近代西方体育输入的前沿阵地和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如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文明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邻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越大。换句话说,人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关键是易接近的程度。那些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是最有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的。”^[14]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正是在与外界的不断交流之中,才成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主要组织之一,同时又将民族传统体育推介给在沪西侨。其次,秉承当时奥运体育业余性的精神,作为最早接触西方体育之一的高校群体,成为优秀运动员培养和选拔的基地。上海高校体育组织也是由各高校志愿结成,不具有官方性质。“合则聚,分则散”,固然使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几次波折,但共同的愿望使得组织能齐心协力推动高校乃至整个上海体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葛剑雄. 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J]. 图书馆杂志, 2011(8): 97-103.
- [2] 胡晓鸣. 上海租界百年对城市发展的启示[J]. 城市规划, 2008, 32(10): 50-54.
- [3]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体育史学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 [4] 编纂委员会. 上海体育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 [5] 郎静. 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49)[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 [6]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J]. 档案与史学, 1997(1): 5-14.
- [7] 王道杰, 周明星, 张晓义. 1890年圣约翰书院运动会史考[J]. 体育文化导刊, 2011(1): 141-144.
- [8] 徐以骅.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9] 上海交大内的老图书馆秘境[EB/OL]. (2010-06-03) [2014-01-03]. <http://2010.qq.com/a/20100603/000157.htm>.
- [10] 辉煌历程之东吴体育[EB/OL]. (2010-01-31) [2014-01-03]. <http://tyxy.suda.edu.cn/ShowA.asp?NewsID=4>.
- [11] 陈刚. 教会学校体育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6): 93-95.
- [12] 金忠明, 李本友. 市民社会与上海近代“海派教育”[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3(2): 53-60.
- [13]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 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1.
- [1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M].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